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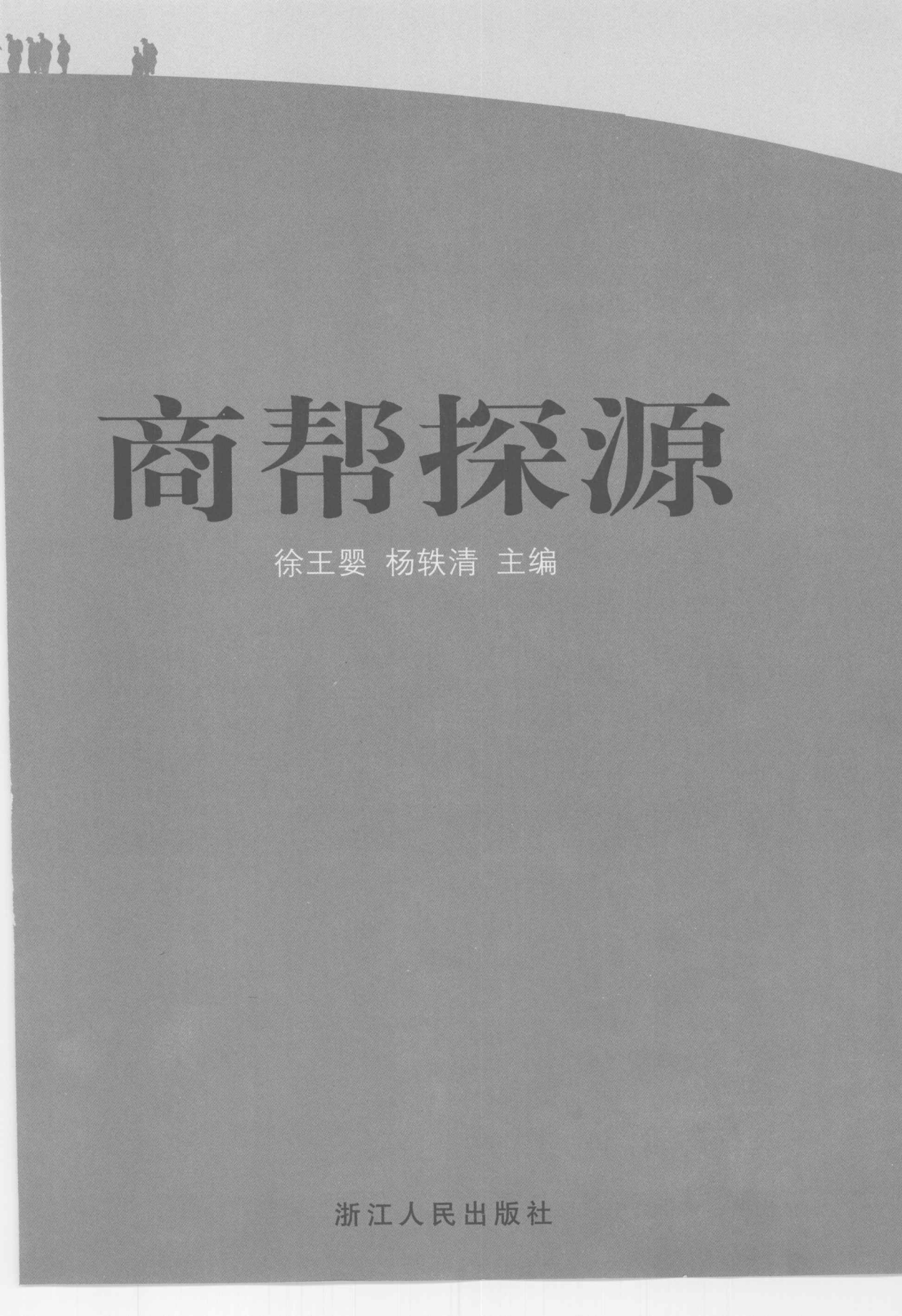


商帮探源

徐王婴
杨轶清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商帮探源

徐王婴 杨轶清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帮探源/徐王婴,杨轶清主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213-03562-3

I.商… II.①徐…②杨… III.商业史—浙江省
IV.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5691 号

书 名

商帮探源

作 者

徐王婴 杨轶清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朱丽芳

责任校对

朱银才 鞠 朗

封面设计

孙晓亮

电脑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2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562-3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本书为首届中国商帮峰会论文集

《商帮探源》编委会

主 任 胡祖光

副主任	谷迎春	蔡惠明	曹大立	吕福新	姚先国	郑明治	吴 晶
	杨 溟	胡宏伟	刘 云	陈建华	周继山	陈红兵	弭永松
	郑斯征	何荣飞	徐天琪	颜春友	王曙光		

委 员	李东昇	卜 飞	李如艳	王虎修	李 强	李祝九	孙东海
	吴振坤	张笑辉	雷永一	李建平	雷 红		

研究商帮文化 提升经济软实力

胡祖光

2006年春天,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参会的既有浙商、苏商、汉商、粤商、鲁商、豫商、冀商等新兴商帮的代表,也有领风气之先的港商、台商代表,还有老树发新枝的晋商、徽商、龙游帮代表等,可谓风起云涌,群贤毕至。这次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浙商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盛会是历史上新老商帮首次大团聚,以中国商帮文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商道”为研讨主题,切磋碰撞,论剑西湖。共同探讨中国商道传承,推动中国商业文明创新,对提升中国经济软实力意义重大。

作为首次峰会的后续工作之一,商帮研究论文集也正式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既是峰会的成果,也是商帮之间交流合作的继续和深入。

为什么晋商、徽商能驰骋三五百年不倒?他们的后人能重现祖上的辉煌吗?作为后起的晚辈,浙商、粤商们如何才能在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激烈竞争中长盛不衰?

在“和合”时代,不同商帮之间的结合点在哪里?我们如何共同挖掘、传承、接续、光大中国的商业文明?我们怎么与跨国公司建立最佳的竞争合作关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商人该如何突破成长的天花板,变地缘优势、血缘优势为市场优势,从而无缝对接世界?

这一系列问题已经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碰撞与探讨,而本书的论文,既与会议主题一脉相承,同时更加深入和丰富。

我们祖辈留下的丰厚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是一笔不灭的财富。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不仅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商业史,留下了最早的传统市场体系,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社会留下了至今仍有借鉴作用的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精神。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利兼容”“敬业乐业”等一系列商业思想,成为各大商帮共同遵守的商道

准则。

昔日的成功不能复制,但他们的得失可资镜鉴。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先辈商人的“长寿基因”,对今日处于起步阶段的后辈助益良多。传承优秀商业文明,创新现代商业规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成功的良方。

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的真正春天来到了。传统的地域文化和商业精神与现代市场意识的结合,形成了一个个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新的商人群体,驰骋南北,纵横天下,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书写了新“十大商帮”的传奇。

新“十大商帮”的崛起,既是中国经济活力昌盛的体现和预兆,也是大联合时代的一个象征,并从此开创了中国商人新的竞合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更加需要交流沟通与合作,取长补短互为借鉴,共同成长进步。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商人该如何突破成长的天花板,变地缘优势、血缘优势为市场优势,从而无缝对接世界,这是摆在所有中国商人面前的一道历史命题,在逐鹿世界的竞争中,全球视野加中国智慧,就是我们的选择。充分运用东方管理思想和中国商道,用中华优秀商业文化来熏陶和提升中国企业家的素养,与世界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碰撞交融,中国商人群体的整体崛起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成世界经济翘楚之日。

历史是一位不知倦怠的行者,时间是一位最公正的裁判者。今天叱咤商海风云的中国商帮杰出精英,须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继承中发扬中国商人诚信创业、实业报国的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胡祖光,浙江省社科联主席,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会长。

目 录

- 001 前言 研究商帮文化 提升经济软实力(胡祖光)

001 第一篇 商帮起源

- 003 晋帮商人溯源(孔祥毅)
- 025 绩溪商帮
——徽商军团中的一支劲旅(胡维平)
- 035 鲁商简述(李鑫生)
- 048 从龙游商帮到当代浙商
——浙江商人的发展与创新(陶水木)
- 053 称雄于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陈学文)

061 第二篇 新商帮崛起

- 063 浙商概述(徐王婴)
- 071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
——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吕福新)
- 088 新台商:台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过亚林)
- 101 中国海洋文化与闽商(沈昌炜)
- 114 苏商新观察(丁荣余 姚蓓 卢锐)
- 121 当代徽商与安徽崛起(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

135 第三篇 商帮文化

- 137 论浙商的“个众”特性
——具有中国意义的主体性分析(吕福新)
- 145 福建文化生态与闽商性格(陈鸿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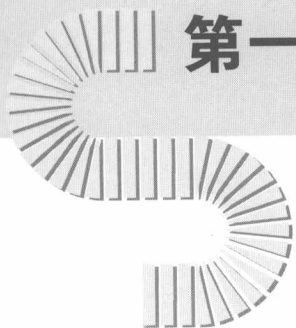
- 154 新鲁商文化论(王蔚)
- 163 文化是因还是果
——从浙商演变看商帮文化(杨轶清)
- 170 解读苏商
——略谈吴地商人的过去和现在(姚东明)
- 175 传统徽商回乡落魄与新时期回乡创业(耿晓原)
- 182 晋商的诚信品格与中国诚信社会建设(孔祥毅)

191 第四篇 商帮比较

- 193 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
——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陈立旭)
- 209 浙商与晋商、徽商、潮商的比较(徐王婴)
- 216 浙商、苏商:产业与资本,谁执牛耳(徐王婴)
- 222 晋商、徽商:现代与历史的“龟兔赛跑”(徐王婴)
- 229 京商、沪商基因密码解密:“皇家血统”与“混血儿”(徐王婴)
- 236 宁波帮与温州人的异同(徐王婴)
- 242 浙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路径分野(徐王婴)

249 第五篇 商帮盛会

- 251 首届中国商帮峰会综述
- 255 传承商业文明 聚合全球资源 推动中国经济和谐发展
——黄孟复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的演讲
- 259 弘扬商业文明 重塑华商辉煌
——徐冠巨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的演讲
- 262 新豫商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力量
——陈义初在首届中国商帮峰会上的演讲
- 269 中国商帮杭州宣言
- 270 峰会观点集萃
- 275 峰会活动剪影
- 281 商脉(代后记)(徐王婴)



第一篇 商帮起源

—— 晋帮商人溯源

—— 绩溪商帮

—— 鲁商简述

—— 从龙游商帮到当代浙商

—— 称雄于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

晋帮商人溯源

孔祥毅

一、古代晋商

(一) 华夏商祖

现代商业行为,一般与市场关系密切,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但是,在城市产生之前,商品交易与市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据《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记载。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②说明尧帝时已经有了简单的社会分工,生产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尧帝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换的组织者。“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③就是说舜做过农夫、渔夫、手工业者和小贩,等等。《史记索引》解释“就时于负夏”时说“就时犹逐时”,即在贱的地方买,到贵的地方卖。可以说,舜帝是华夏商祖。“舜巡视天下,不幸死于道途,即‘葬南己之市’”。^④城市的发展是沿着集市—街市—城市逐步演进的,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首先开始,时间长了、规模

① 陈鼓应等:《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650 页。

② 《淮南子·齐俗训》,见《传世藏书》第二卷,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41 页。

③ 《史记·五帝本纪》,见《史记》三卷本,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 页。

④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第 4 页。

大了,就不再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而是就地盖房屋,形成街市;街市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演变为城市。夏代,在夏都以及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平阳、蒲坂、安邑、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相传,夏县是黄帝妻子嫫祖出生地,她发明了育桑养蚕、缫丝织帛,并染成各种颜色,用来缝制衣物。考古学家曾在夏县西引村发现蚕茧化石,证明蚕丝在山西已有四千多年历史。^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品的交换发展。“据说夏朝的末代君主桀荒淫无道,竟然‘放虎于市,以观其惊’,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难怪商汤兴师讨伐时,市上卖东西的人都抛弃自己的货物,纷纷出城投奔商汤。”^②这里可以看到夏朝的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了。需要指出的是,据历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

(二) 晋人铸币

实物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货币。从禹到夏代,是不是已经有了货币交换,没有考古的实物证明。不过《管子》说,“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也可能是一种推想。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比较客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③说从虞舜、夏到商朝,货币是由金、布、刀、龟贝等多种物品扮演的,“及至秦”,货币才得到统一。那么夏、商、周之间将近 1800 余年,就是商品交换对交易媒介物单一化的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西地区是走在最前面的。

商代,山西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概指的是一般平民。”^④

① 渠绍森:《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 2006 年 8 月 10 日。

②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第 5 页。

③ 《史记》三卷本,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94 页。

④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6 页。

因为今太原地区始终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当时,在今山西地区的交换媒介,有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成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1971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 109 枚、海贝 112 枚,^①证明商代在晋阳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国经济富庶,手工业发达,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空前繁荣。晋文公(公元前 697—前 628)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定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②政策,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保证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③在太原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晋国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晋国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在提到这些巨富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④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年,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轹(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⑤

① 《文物》,1972 年第 4 期。

② 《国语·晋语四》。

③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

④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8 页。

⑤ 《史记》三卷本,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28 页。

可见山西已经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商品交换的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 1971 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公元前 1600—前 1100)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 600 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 500 到 1000 年(公元前 700—前 600 年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是西方铸币之始)。当时,古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在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内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清理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于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中还同时出土相当数量的空首布陶范和布首釜内的范芯,空首布陶范中以范芯为多,如一个 4 米×4 米的发掘方中范芯的堆积厚达 60 厘米,据多年来积累所得范芯估计约有数十万件。有的布范内还留有尚未取出的空首布。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铸造空首布的规模与数量是相当庞大的。”^①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币厂,比欧洲出土的公元 3 世纪罗马铸币工场早 700—1000 年。

贝币从殷商至春秋初行用较多,并经历了从真贝到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行用约三四百年,东周初逐渐退出流通。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 1600 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在古晋国出土春秋战国空首布的有太原、榆次、寿阳、侯马、运城、稷山等地;出土平首布的有太原、祁县、交城、汾阳、高平、阳高、原平、陵川、天镇、孟县、夏县、洪洞、朔县、襄汾、运城、屯留、代县、浮山、山阴、翼城、侯马、黎城、繁峙、怀仁、平陆、忻州、定襄、右玉、左云、灵丘、五台、忻县、万荣、永济、芮城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永济、高平、原平、朔县、孟县、浑源、神池、怀仁、右玉、左云等地;出土圆钱的有闻喜、侯马、翼城等等。

(三) 晋商北拓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为了防御匈奴南下,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 196 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即后来的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晋阳,晋阳当时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铜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

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①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聂翁壹的后人张辽,也与匈奴联系进行走私贸易,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②勾注即雁门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资。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山西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

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曾记有:“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西汉末、东汉初年。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借“丝绸之路”之便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③两汉时期,除了盐铁及其他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六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④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西晋(265—316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公元398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

① 《二十五史》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9 页。

② 吕思勉:《秦汉史》。

③ 渠绍森:《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 2006 年 8 月 10 日。

④ 《二十五史》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7 页。



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4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550—577),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各地以及西域诸国贸易往来。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山西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1999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从其父起就依附于一个名为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起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有600多户,59岁时卒于太原。虞弘在579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责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这就是虞弘。^①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座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

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山西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山西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的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四) 票据萌芽

公元581年杨坚灭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公元618年李渊父子灭隋,因李渊祖父李虎在南北朝时被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了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太原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十三县。公元690年改称“北都”,后改“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资,又大修宫殿城池,形成了都城、东城、

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发达,手工业、商业亦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据《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751年)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中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共十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懔、吕礼”。^①这说明山西手工业者在公元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到唐玄宗天宝元年作为北京的太原,与京城长安、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太原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通典》卷七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中国民间的借贷活动发展到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办理借贷活动的信用机构,谓之“质店”。到唐朝出现“柜坊”、“僦柜”、“寄附铺”等信用机构,这些办理信用业务的机构多是兼营,还不是专业金融机构。山西人参与当时信用机构,比如存款于寺庙,《会昌解颐录·牛生》记载了柜坊的事:“牛生自河东赴举……至菩提寺,……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湫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遇。”^②晚唐晋中祁县人温庭筠(约812—870年),在他的《乾溪子》中《扶风宝义》记载:“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又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间。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又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又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以直出钱市之。”^③

从公元907—979年的70多年间,并州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969年派兵攻打北汉,979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

① 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丛刊《山西外贸志》,第4页。

②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0页,第391页。